

順生論

张中行  
著



中华书局

## 再版说明

这是一本深入浅出简明切实地谈论人生哲学的著作。

作者在《后记》里说明，此书是易古人的“率性”为“顺生”，意在阐发自己关于“怎样活才好”的种种人生见解。书稿酝酿于五十年代中期，写出的部分初稿毁于文革期间，七十年代后重新补写了一部分后又搁置多年，于1991年4月决定续写，最后完成于1992年5月，成书过程约四十年之久。作为著名的文史专家和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，作者运用自己厚实的人生经验和丰湛的人文知识，把人生的方方面面梳理为三个方面的六十个问题，从古今沟通、中外比较的角度条分缕析，推本溯源，而且以散文化的笔墨娓娓道来，使全书在理论与实际相联系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人生思索中，开人眼界、启人胸襟。

《顺生论》，199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，1997年收入该社出版的《张中行作品集》第四卷。今征得张中行先生及其家属同意，据1993年初版重新录排，并增补引文出处和少量注释，再次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6年1月

这是一篇不该写而终于决定写的文章。不该写的原因，比喻说，居室内只有几件多年伴随的破桌子、烂板凳之类，而视为奇珍，并拦住过路人，请人家进来欣赏，这说轻些是愚陋，重些是狂妄。而又决定写，如文题所示，是因为先与“读书”，后与《读书》，有些关系。后来居上，且说近一两年来，不知道以何因缘，我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，竟连续占了《读书》的宝贵篇幅。根据时风加市风，印成铅字的名字见三次以上，就有明眼人或不明眼人大注其意。自然，也因为文中总不免有些不三不四，或说野狐禅气，有些认真的人就不淡然置之。于是，据说，有人发问了：“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？”又据说，这问是完全善意的。何以报？想来想去，不如索性把不三不四的来路和情况亮一下；看了家底，也就不必再问了吧？这家底，大部分由“读书”来，小部分由“思考”来；思考的材料、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，所以也无妨说，一切都是由读书来。这样说，

没有推卸责任之意,因为书是我读,思考是我思考,辫子具在,跑不了。语云,言者无罪,说是这样,希望实际也是这样。以下入正文,围绕着读书和思考,依老习惯,想到哪里说到哪里。

—

由呱呱坠地说起。遗憾也罢,不遗憾也罢,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,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那样的书;还不只我没闻过,就我及见的人说,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。家庭是京、津间一个农户,虽然不至缺衣少食,却连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也没有。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,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,只好顺应时势,入镇立的新式学堂。读的不再是三、百、千,而是共和国教科书。国文是重点课,开卷第一回是“人手足刀尺,山水田,狗牛羊”,比下一代的“大狗叫,小狗跳”死板得多。时代不同,据说总是越变越好。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,我不知道;但不同确是不错,大不同是: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,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。忝为学生,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。学校没有图书馆,镇上也没有;又不像江南,多有藏书之家,可以走宋濂的路,借书看。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,是不入流的“小说家者流”颇为流行,譬如这一家有《济公传》,那一家有《小五义》,就可以交换着看。于是,根据生物,为了活,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,就东家借,西家换,大量地看旧小说。现在回想,除了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之外,通行而大家熟知的,历史,侠义,神魔,公案,才子佳人,各类的,不分文白,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,几乎都看了。有的,如《聊斋志异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镜花缘》等,觉得特别有意思,还不只看一遍。

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,连续几年,现在问,得失如何?失难说,因为“不如怎样怎样”是空想,不可能的事,不管也罢。只说得(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),如果教训也算,可以凑成三种。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,后来略发展,成为不以读书为苦,再发展,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。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,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,用白,用文,都像是不很费力。还有一种是教训。古人说,诗穷(多

指不能腾达)而后工。我想可以扩而充之,说书也是穷(多指财货少)而后能读。专说我的幼年,依普通农家的传统,是衣仅可蔽体,食仅可充腹。娱乐呢,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,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,冬闲的时候,男顽童聚在一起,只能用碎瓦片、断树枝做投掷、撞击的游戏。这很单调,而精力有余,只好谋消磨之道,于是找到最合用的,书。何以最合用?因为可以供神游,而且长时间。总之,因为穷,就读了不少。现在,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,不要说幼儿园,就是小家庭里,如果有小孩,也是玩具满坑满谷,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、会唱会闹的。我老了,步伐慢,跟不上,总有杞人之忧,像这样富而好乐,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?——不好再说下去,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,大作其《迎穷文》了。

## 二

总有七八年吧,小学不好再蹲下去。农,士,商,三条路,受了长兄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影响,走熟路,考入官费的通县师范学校。成文规定,六年毕业;不成文规定,毕业后到肯聘用的小学当孩子王。不知为什么,那时候就且行善事,莫问前程。课程门类不少,但考试及格不难,可以临阵磨枪,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无事可做。学校多年传统,两种权力或自由下放给学生,一种是操办肉体食粮,即用每人每月四元五角官饭费办伙食;一种是操办精神食粮,即每月用固定数目的图书费办图书馆。专说所谓图书馆,房间小,书籍少,两者都贫乏得可怜。但毕竟比小学时期好多了,一是化无为有,二是每月有新的本本走进来。其时是20年代后期,五四之后十年左右,新文学作品(包括翻译和少数新才子佳人)大量上市的时期,又不知道以何因缘,我竟得较长时期占据管理图书馆的位置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于是选购、编目、上架、借收等事务之余,就翻看。由于好奇加兴趣,几年时光,把这间所谓馆的旧存和新购,绝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,小部分是介绍新思想的,中的,由绍兴周氏弟兄到张资平、徐枕亚,外的,帝俄、日本、英、法、德,还有西班牙(因为生产了唐·吉珂德),凡是能找到的,几乎都看了。

与小学时期相比,这是由温故而走向维新。有什么获得呢?现在回想,半瓶醋,有时闭门自喜,不知天高地厚。但究竟是睁开眼睛,瞥了一下新的中外,当时自信为有所见。就算是狂妄吧,比如,总的说,搜索内心,似乎怀疑和偏见已经萌了芽。这表现在很多方面,如许多传统信为真且正的,上大人的冠冕堂皇的大言,以至自己的美妙遐想,昔日赞而叹之的,变为半信半疑,或干脆疑之了。这是怀疑的一类。还有偏见的一类,专就文学作品说,比如对比之下,总觉得,散文,某某的不很高明,因为造作,费力;小说,某某的,远远比不上某些翻译名著,因为是适应主顾需求,或逗笑,或喊受压,缺少触动灵魂的内容。这类的胡思乱想,对也罢,错也罢,总而言之,都是由读书来的。

### 三

30年代初我师范学校毕业,两种机缘,一堵一开,堵是没有小学肯聘用,开是毕业后必须教一年学才许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,合起来一挤就挤入北京大学。考入的是文学院,根据当时的自由主义,入哪一系可以自己决定。也许与过去的杂览有关吧,糊里糊涂就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。其时正是考证风刮得很厉害的时候,连许多名教授的名也与这股风有关,如钱玄同,把姓也废了,改为疑古;顾颉刚越疑越深,以至推想夏禹王是个虫子;胡适之的博士是吃洋饭换来的,却也钻入故纸堆,考来考去,说儒的本职原来是吹鼓手;等等。人,抗时风是很难的,何况自己还是个嘴上无毛的青年。于是不经过推理,就以为这考证是大学问,有所知就可以得高名,要加紧步伐,追上去。追,要有本钱,这本钱是依样葫芦,也钻故纸堆。在其时的北京大学,这不难,因为:一,该上的课不多,而且可以不到;二,图书馆有两个优越条件,书多加自由主义。书多用不着解释,专说自由主义,包括三项:一是阅览室里占个位子,可以长期不退不换;二是书借多少,数量不限;三是书借多久,时间不限。于是利用这种自由,我的生活就成为这样:早饭、午饭之后,除了间或登红楼进教室听一两个小时课之外,经常是到红

楼后面，松公府改装的图书馆，进阅览室入座。座是自己早已占据的，面前宽宽的案上，书堆积得像个小山岭。百分之九十是古典的，或研究古典的。先看后看，没有计划，引线是兴趣加机遇，当然，尤其早期，还要多凭势利眼，比如正经、正史，重要子书，重要集部，一定要看，就是以势利眼为指导的。机遇呢，无限之多，比如听某教授提到，逛书店碰到，看书，王二提到张三，张三提到李四，等等，就找来看。兴趣管的面更广，比如喜欢看笔记，就由唐、宋人的一直看到俞曲园和林琴南；喜欢书法，就由《笔阵图》一直看到《广艺舟双楫》。量太大，不得不分轻重，有些，尤其大部头自认为可以略过的，如《太平御览》《说文解字诂林》之类，就大致翻翻就还。这样，连续四年，在图书馆里乱翻腾，由正襟危坐的《十三经注疏》《资治通鉴》之类到谈情说爱的《牡丹亭》《霓裳续谱》之类，以及消闲的《回文类聚》《楹联丛话》之类，杂乱无章，总的说，是在古典的大海里，不敢自夸为漫游，总是曾经“望洋向若而叹”吧。

也要说说得失。语云，开卷有益，多读，总会多知道一些，有所知就会有所得。这是总的。但是也有人担心，钻故纸堆，可能越钻越糊涂。明白与糊涂，分别何所在，何自来，是一部大书也难得讲明白的事。姑且不求甚解，也可以从另一面担心，不钻也未必不糊涂。还是少辩论，且说我的主观所得。一方面是积累些中国旧史的知识，这，轻而言之是资料，可备以后的不时之需；重而言之是借此明白一些事，比如常说的人心不古就靠不住，古代，坏人也不少，尤其高高在上的，他们的善政都是帮闲或兼帮忙的文人粉饰出来的。另一方面是学了点博览的方法，这可以分作先后两步：先是如何找书看，办法是由此及彼，面逐渐扩大；后是如何赶进度，办法是取重舍轻，舍，包括粗看和不看。这些，我觉得，对我后来的“尽弃其学而学焉”确是有些帮助。失呢，也来于杂览，因为不能专一，以致如室中人多年后所评，样样通，样样稀松。或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论杂家所说：“杂家者流，盖出于议官，兼儒墨，合名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，此其所长也。及荡者为之，则漫羨而无所归心。”

## 四

大概是大学四年的末期，脑海里忽然起了一阵风暴。原来底子薄，基础不巩固，抗不住，以致立刻就东倒西歪，具体说是有了强烈的惶惑之感。还可以具体并重点地说，是心里盘问：偏于破的，如舜得尧之二女，是郗鉴选东床坦腹式的许嫁或卓文君式的私奔，还是曹丕得甄氏式的抢，三代之首位的夏禹王，是治水的圣哲兼开国之君，还是个虫子，等等，就是能考清楚了，远水不解近渴，究竟有什么用？偏于立的，生而为人，生涯只此一次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有意义，意义何在？要怎样生活才算不辜负此生？等等问题是切身的，有精力而不先研讨这个，不就算是辜负此生了吗？这是注意力忽然由身外转向身内。何以会有此大变？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。但这变的力量是大的，它使我由原来的自以为有所知一霎时就如坠五里雾中。我希望能够尽早拨开云雾而见青天。办法是胸有成竹的，老一套，读书，读另一类的书。起初是乐观的。这乐观来于无知，以为扔开《十三经注疏》之类，找几本讲心理、讲人生的书看看，就会豁然贯通。当然，这乐观的想法不久就破灭了。破灭有浅深二义：浅的是，不要说几本，就是“读书破万卷”也不成；深的是，有些问题，至少我看，借用康德的论证，是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的。这些后面还要谈到，这里只说，因为想拨开云雾，我离开大学之后，就如入了另一个不计学分、不发证书的学校，从头学起。

这另一个学校，没有教室，没有教师，没有上下课的时间，更糟的是学什么课程也不知道。起初，只能用我们家乡所谓“瞎摸海”（称无知而乱闯的人）的办法，凭推想，找，碰，借，读读试试，渐渐，兼用老家底的由此及彼、面逐渐扩大法，结果，专就现象说，就真掉进书或新知的大海。这说来嫌话太长，只好化繁为简，依时间顺序，举一斑以概全豹。先是多靠碰，比如还看过经济学的书，不久就发现，它只讲怎样能富厚，不讲为什么要富厚，文不对题，扔开。另一种情况是百川归海，终于找到冤有头的头，债有主的主。这百川，大致说是关于人以及了解人有关的各门科学知识。人，或说人心，中国传统也讲，缺点是玄

想成分多，比如宋儒的天理与人欲对立，就离实况很远。所以我一时就成为“月亮也是外国的圆”派，几乎都读真洋鬼子写的。由近及远，先是心理学，常态的，变态的，犯罪的，两性的，因而也蔼理斯，特别欣赏弗洛伊德学派的，因为深挖到兽性。向外推，读人类学著作，希望于量中见到质；再推，读生物学著作，因为认为，听了猫叫春之后，更可以了解禅定之不易。直到再向外，读天文学著作，因为那讲的是生的大环境，如果爱丁顿爵士的宇宙膨胀说不错，人生就化为更渺小，意义就更难说了。说到环境，这牵涉到万有的本质问题（科学成分多），知识的真假、对错问题（哲学成分多），于是就不能不读偏于理论的科学著作。而所有这些都我个人说，都是为解答一个问题，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所以百川就归了海，这海是“人生哲学”。这门学问也确实不愧称为海，西方的，由苏格拉底起，东方的，由孔子起，还要加上各种宗教，著作浩如烟海。只好找重要的，一本一本啃。洋鬼子写的，尽量用中译本；没有中译本，英文写的，找原本，非英文写的，找英文译本。与科学方面的著作相比，这人生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主干，所以读的种数，用的时间，都占了首位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是归拢后的再扩大，也可以说说。那是因为哲学的各部门有血肉联系，读一个部门的，有如设宴请了某夫人，她的良人某某先生，甚至姑娘等系的表姐表妹，也就难免跟了来。人生哲学的戚属很多，比如你总追问有没有究极意义，就不能不摸摸宇宙论；有所知，有所肯定，不知道究竟对不对，就不能不摸摸知识论；而一接近知识，就不免滑入逻辑；等等。总之，找来书读，像是越读问题越多，自己不能解答，就只好再找书，再请教。就这样，读，读，旧问题去了，来了新问题，小问题去了，来了大问题，直到人借以存在的时、空及其本原是怎么回事也成为问题，就问爱因斯坦，及至知道他也并非彻底清楚，就只能抱书兴叹了。说句总结的话，这一阶段，书确是读了不少，所得呢？一言难尽。

## 五

严格说，不应该称为“得”，因为情况复杂，复杂到扪心自问，自己

也有账算不清。语云，读书明理，难道反而堕入佛家的无明了吗？也不尽然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是小问题消减了，大问题明显了。明显到自信为不能解决，所以其结果就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，成为大事糊涂，小事不糊涂，颇为可怜了。以下具体说这可怜。可怜由零碎的可喜来，先说可喜。这也不好枚举，只说一点点印象深的，影响大的，算作举例。一种，姑且名之为“方法”，曰无成见而平心静气地“分析”。姑嫂打架，母亲兼婆母必说姑直而嫂曲，邻居不然，说针尖对麦芒，母用的是党同伐异法，邻居用的是分析法。显然，治学，定是非，分高下，应该用分析法，事实上许多人也在用分析法。且说我推重这种方法，并想努力用，主要是从薛知微教授（19世纪末在伦敦大学任教）的著作里学来的。他著作不少，只说一本最有名的《伦理学之方法》。书的高明之处，为省力，引他的高足伯洛德先生的意见（非原文）：对某一个问题的，他总是分析，就是从这个角度看，如此如此，从那个角度看，如彼如彼，都说完，仿佛著者并没什么主见，可是仔细想想，人类智力所能辨析的，不过就是这些，思想的高深就蕴含在这无余义之中。这可谓知师者莫如徒。这本书我读了两遍，自信为有所得，其最大者是：确知真知很难，许许多多久信的什么以及宣扬为应信的什么，绝大多数是经不住分析的；因而对于还未分析的什么，上德是“不知为不知”。另一种，姑且名之为“精神”，曰无征不信的“怀疑”。就我所知，在这方面，也是进口货占上风。古希腊有怀疑学派，虽然庄子也曾“不知周之梦为胡蝶”，“胡蝶之梦为周”，可是意在破常识，所以没有成为学派。大大的以后，法国笛卡尔也是由怀疑入门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。这些都可以不计，只说我更感兴趣的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罗素，他推重怀疑，而且写了一本书，名《怀疑论集》。主旨是先要疑，然后才能获真知。他举个有趣的例，是英国课本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之力，德国课本说是德国人之力，他主张让学生对照着念这两种，有人担心学生将无所适从，他说，能够使学生不信，教育就成功了。他的怀疑还有更重大的，是继休谟之后，怀疑归纳法的可靠性。举例说，如果把“一定还有明天”当作可信的知识，这信是从归纳法来的，因为已经一而再，再而

三，就推定一定还有三而四。为什么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其后必有三而四？因为我们相信自然是齐一的（有规律，不会有不规律的变）。何以知道自然是齐一的？由归纳法。这样，自然齐一保归纳法，归纳法保自然齐一，连环保，就成为都不绝对可靠了。就举这一点点吧，分析加怀疑，使我有所得也有所失。得是知识方面的，也只能轻轻一点。先说个大的，比如对于生的大环境的底里，我确知我们殆等于毫无所知，举个最突出的例，我们这个宇宙，用康德的时间观念（与爱因斯坦的不同），问明天还有没有，自然只有天知道。如是，计划也好，努力也好，都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。再说个小的，比如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，我确知这决定力量是身内（相貌、能力等）身外（地位、财富等）两方面条件相加，再加机遇，而不是西湖月下老人祠中的叩头如捣蒜。总之，辨识真假、是非的能力强了，大大小小的靠不住，虽然未必说，却可一笑置之。失呢？大失或大可怜留到下面说，这里只说小失，是心和身常常不能合时宜，这包括听宣传、看广告都不怎么狂热之类。浮世间，为了争上游，至少是为了活，大概常常不得不狂热或装作狂热吧？每当这种时候，分析方法和怀疑精神等就来捣乱，以致瞻前顾后，捉襟见肘，苦而不能自拔了。

## 六

以下正面说可怜，包括两类：一类是大问题不能解答，以致难得安身立命，这一节谈；另一类是不得已而退一步，应天顺人，自欺式地自求多福，下一节谈。记得英国培根说过（《新工具》）：“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，终于信仰。”不知道这后半，他做到没有。我的经验，想做到，就要脚踩两只船，一以贯之必不成。这两只船，比如一只是冥思室或实验室，一只是教堂，在室里虽然被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包围，到堂里却可以见到上帝；通晓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可以换取世间的名利，安身立命却要由上帝来。我可怜，是因为不能脚踩两只船，而习惯于由怀疑起，一以贯之。比如喜欢追根问柢就是这种坏习惯的表现。追问，有天高皇帝远的，如历史上的某某佳人，就真能作掌上舞吗？某某

的奉天承运，就真是来于救民于水火吗？远会变为近，也追问关于人的，不合时宜，单说关于理的。各时代都有流行的理，或说真理，新牌号的大多不许追问，老牌号的升迁，以至很多人想不到追问。如果起于怀疑而一以贯之，就难免（在心里）追问：所信的什么什么最对，至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，仍以人生哲学为例，厚待人比整人好，为什么？答曰，因为快乐比痛苦好。一般人到此不问了，薛知微教授之流还会问，为什么？比如答复是快乐比痛苦有利于生活，惯于追根问底的人还会问，为什么利于生活就好？甚至更干脆，问，为什么生就比死好？显然，这公案只能终止于“不知道”。遗憾的是，我也诚心诚意地承认，能信总比不能信好，因为可以安身立命。话扯远了，还是赶紧收回来，谈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确是很可怜，借用禅和子的话形容，是在蒲团上用功多年，张目一看，原来还是眼在眉毛下。直截了当地说，关于人生有没有意义，或说有没有目的，我的认识是，胆量大一些答，是没有；小一些答，是无法证明其为有。这胆小一些的答复是由宇宙论来，因为宇宙何自来，将有何归宿，以及其中的千奇百怪，大到星云的旋转，小到一个蚊子哼哼哼，为什么，有何必要或价值，我们都说不上来。不好，这扩大为谈天，将难于收束。那就下降，专说人。天地间出现生命，生命有强烈的扩展要求，于是而我们就恋爱，凑几大件成婚，生小的，小的长大，再生小的，究竟何所为？平心静气，实事求是，只能说不知道。孔老夫子说“畏天命”，畏而不能抗，又不明其所以然，所以成为可怜。这可怜，说句抱怨的话，也是由读书来的。

## 七

大问题不能解答，或者说，第一原理树立不起来，是知识方面的迷惘。但迷惘也是人生的一个方面，更硬梆的现实是我们还活着。长日愁眉苦脸有什么好处呢？不如，事实也是人人都在这样做，且吃烤鸭，不问养壮了有什么意义。这是退一步，天上如何不管了，且回到人间打算盘，比如住楼房比住窑洞舒服，就想办法搬进楼房，而不问舒服和

不舒服间还有什么大道理。这生活态度是《中庸》开头所说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用现代语注释是：人有了生就必须饮食男女，这是定命，到身上成为性，只能接受，顺着来，顺着就是对；但人人顺着也难免有冲突，比如僧多粥少就不免于争，所以还要靠德、礼、法等来调节。对于这种生活态度，几乎是人人举手赞成，认为当然。我也赞成，却受了读书之累，不是认为当然，而是认为定命难抗，只好得过且过。或说得冠冕些，第一义的信仰既然不能树立，那就抓住第二义的，算作聊以自慰也好，甚至自欺也好。正如写《逻辑系统》的小穆勒先生，长期苦闷之后，终于皈依边沁主义（其主旨为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），既已皈依，就死生以之。这当然也得算作信仰，但其中有可怜成分，因为不是来于理论的应然，而是来于实际的不得不然。说句泄气的话，是生而为人，要活，并希望活得如意些，就不能不姑且相信应该分辨是非，有所取舍。取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所以还要尽人力，想办法。边沁式的理想，我们很早就有，那是孟子的众乐主义。孔、孟是理想主义者，凡理想主义都不免夹带着乐观主义，他们相信，只要高高在上者英明，肯发善心，人间就会立刻变成盛世。事实是在上者并不发善心，或根本就没有善心，因而人间就始终不能盛。与孔、孟的眼多看天相比，荀子眼多看地，于是就看见性恶以及其本原的“欲”。两千年之后，西方的弗洛伊德不只看见欲，而且经过分析，说欲可以凝聚为“结”，所以不得了。这要想办法，以期不背离边沁主义或众乐主义。他的想法写在名为《一种幻觉的将来》那本不厚的书里，主旨是：因为人生来都具有野性，所以应当以“文”救之。此文，我的体会，包括习俗、道德、法律、组织、制度等等。具体应该如何？难说，而且不好说，只好不说。

## 八

很快就迎来“四十而不惑”。不惑有自足的一面，是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；有影响的一面，是原地踏步，看着别人走出很远，难免感到寂寞。旧习难改，仍然读书。性质有变，以前是有重心，略有计划，而今变为

阮步兵的乘车式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碰见什么是什么。比以前数量少了，因为难得主动。获得呢？天方面，依然故我；人方面，也借助历练，像是所知更多一些。古人说，“察见渊鱼者不祥”，装作不知也罢。一晃又是四十年，也许应该算算总账了吧？不敢用《旧约·创世记》的算法，那会后悔吃智慧果，痛哭流涕。但事实是不能变的，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是事实，既往咎之也没有用，还是不悔恨的好。也无妨从另一面看。现在时兴旅游，读书也是旅游，另一种性质的，地域更广阔，值得看看的更多。缺点是有些地方，比如天，至少我是，看不清楚。但这也未尝不可引孔子的话来解嘲，那是：“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写到此，想到重实际的哪一位也许要说，所有这些不过是文字般若。这我承认，但就算只是文字，既然可以称为般若，它就有可能引来波罗蜜多；纵使不能引来，总比无明而自以为有明好一些吧？这样说，对于“我与读书”，作为终身大事，我的态度显然还是“家有弊帚，享之千金”一路。蠹鱼行径，是人生的歧途吗？大道本多歧，由它去吧。

张中行

1990年3月12日

# 第一分 天心

# 一 存 在

“存在”是个最难解的谜。

我们能够觉知有外界，能够觉知有我。“存在”是存在的，这是“有”的证明。“觉知”可能是幻，有幻即是“有”。记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过，我们住在“有”的世界里，不能想象“无”。的确，我们想象到的常常是“空”，即抽去一切物的空间，不是“无”。假设“存在”缩小，一直缩到由无限小变为零，这是什么形态？难于想象，因为我们的设想中不能消除“空”“时”。我们不得不承认“有”，不得不承认“存在”。

我们住在地上，占咫尺之地，凭借觉知逐渐认识一点点宏观世界的景象。地是绕日的一个行星。日是银河系里千千万万恒星里的一个恒星。恒星之间有距离，以光年（每秒三十万公里行一年的长度）计，最近的有几光年。银河系的直径约十万光年。银河系是螺旋状星云。银河系之外，各种形状的星云还有很多很多。近年发现，距银河系一百多亿光年之处还有天体。还有

人设想,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个具有某种性质(例如由物质组成)的整体,还可能不同性质(例如由反物质组成)的整体,即另一世界。这是天外有天。总之,都属于“存在”。这个“存在”远到何处为止?康德以为,这是超出人类理性能力以外的问题,因为设想有边缘,就会有“边缘以外”。很可能是无边。

宏观是一端,另一端是微观。古人已经知道,“一尺之棰,日取其半,万世不竭”(《庄子·天下》)。近代科学分析出许多视力所不及的存在物,如分子、原子、电子等。小至于电子,还是个复杂的构造。是否有不能再分的单位?有其物而不能分析,难于想象。这方面也可能是无边。

我们是有限,“存在”是无限。我们的悟性是归纳外界的有限活动而形成的,可能不适用于无限。

何以会有这样一个“存在”?如果凡是出现的都是必然的,这个“存在”是顺从意志的必然呢,还是顺应天运的必然呢?“存在”之先能有意志或天运吗?如果“存在”存在于时间的绵延之中,在最初,以何因缘而忽然出现“时间”,生此“存在”呢?如果“存在”是无始,什么力量限定会长此这样而不是“无”或其他形态呢?有的终是有了,有其事似应有其理,可惜我们难知此理的究竟。

我们觉知的存在物,其动或变都有条理,或者说有惯性。这个限定从何而来?是设定的呢,还是自发的呢?不知道。我们用归纳法,根据存在物的条理或惯性,摸索出一些规律。存在物的条理或惯性会不会变?据我们所知,还没有变。也可能没有变的可能。但我们没有理由保证不会变,因为就“存在”之为无限说,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

“存在”有没有目的?或者只是有某种趋向?似乎看不出来有什么目的。人类所谓目的,是生于有所欲,“存在”未必有所欲。如果设想有“存在”之上的什么赋予什么目的,就又遇见上面提出的问题,这个“存在”之上的什么从何而来?

关于“存在”,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。就是自以为知道的一点点,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,也很成问题。例如对于任何事物,我们都是放在“时间”的格子里来理解的,时间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,从古到今,按